

学者卷

乡路带我回家 / 葛兆光

雾失楼台 / 黄秋耘

置身西西里 / 雷达

大地书页 / 楼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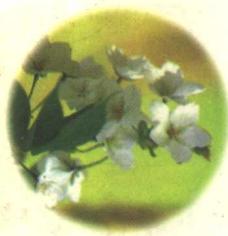
老北京胡同 / 萧乾

忆高崇熙先生 / 杨绛

风雨天一阁 / 余秋雨

好一朵木槿花 / 宗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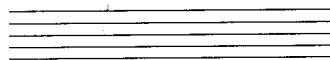
囚者与遁者 / 朱大可



中国当代散文检阅

学者卷

•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中国当代散文检阅·学者卷

朱 鸿 周东坡 选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875 印张 5 插页 293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224-04049-5/I · 919

定价：19.00 元

序言一

贾平凹

1

中国散文的一兴一衰，皆是真情的一得一失。六十年代初期之所以产生一批散文名家和名作，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依赖的便是真情的勃发。但不久社会生活的不正常，散文顿跌于套式，后一场文化革命使人的虚假恶性发展为疯狂，文风以唯美主义又更衍变为一种声嘶力竭的空喊，以致从此声名狼藉。

2

唾弃轻而狂的文风，有人却走向另一绝地，使散文的题材狭窄，精神脆弱，仅写于花花草草，矫揉造作，充满女人气，男不男女不女的二性子气，小，巧，甜腻。振兴中华，紧要的是振兴国民性，增强民族的自尊自强自立的素质，散文要以此为己任，让时代精神进来，让社会生活进来，张扬大度、力度，弃去俗气、小气。

3

中国的文字愈来愈走向世界，散文要破除框式，搞中西杂交。弄通弄懂什么是民族传统的东西，什么是外来的现代的东西，融汇化合，走出一条极民族化的又极具有现代意识的路子。散文之所以是散文，只有这么开放，才能坚实地独立于文坛。

1

散文应该是美文，不仅是写什么，而还要怎么写。有人将散文当作写小说前的训练，或应景之作，敷衍成篇糟蹋散文的面目。散文的身价在于它的严肃和高尚，要扫除一切陈言，潜心探索它的结构、形式、文字，反复试验和实践，追求它应有的时空。

我们读《古文观止》，读中学课本，看到了历史上的那些散文大家，写得那一二篇绝美的抒情文，以为散文就是这类，但为了读到某一大家的更多的抒情文而翻阅他的文集时，我们常常吃惊他的一生仅仅是写了这几篇抒情文，而大量的是谈天说地和评论天下的文章，原来他们始终是以生命体证天地自然。社会到了今日，出版业异常发达，做文章的人太容易有出版和发表的地方，为出版而发表而做文章，文章必然量多质劣。

当然，文章的好坏，是时代之势左右，汉唐的文章只能是在汉唐，明清的文章只能是在明清。说过了，一个时代的文章总体水准由一个时代而定，但往往是一个作家的具体作品却改变了某个时期的文风。作家个人的作用实在是相当大的。中外的文学史已经证明：真情实感后，文章兴，浮艳虚假，文章衰。文学史上之所以有大家，大家之所以出现，就是在每一个世风浮靡、文风花拳绣腿的时期有人力排陈腐，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

序言二

周鹏飞

中国是一个散文艺术辉煌灿烂的地域。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那些有力而机智的妙手。唐宋八大家，曾起了中国古典散文的雄伟高峰。明清小品文，开辟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清幽境界。关于中国现代散文，鲁迅在回答一个美国记者的提问时指出，它的成功在小说和诗歌之上，这种观点，已经得到时间的证明。

中国当代散文是在中国古典散文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基础之上发生的，它继承了它们的全部精华，而且它有幸地吸收了外国散文的思想与技巧。当然，它走过一定的弯路。但是，中国当代散文，特别是八十年代的散文，及其在九十年代崛起的新的随笔小品，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一个汪洋恣肆的景观，特别是对人性人情人的心理的挖掘，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高度。中国当代散文在报纸、杂志和书籍所占的广阔位置，是任何时代都没有的。它以智者的步伐，走进了哲学思绪，也以百姓的步伐，走进了日常生活之中。总之，当代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从中国当代散文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感情、见解、知识和美感。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对中国当代散文做一次检阅，非常必要！

我相信即将出版的这套散文丛书，是经过精心策划和选编的，我特别赞赏这样一个举措：绝不允许书中出现错字和别字！没有一种向出版陋习挑战的勇气和技能，将难以胜任这个

艰苦的工作,这仿佛是从禾苗之中除尽野草,从小米中拣尽沙粒。但是,唯有以优质高效的标准对待出版工作,才是上策,才是符合生存规律的选择。不容置疑,陕西人民出版社将继续以这种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出版的图书。

目 录

| | | |
|-----|------------|----|
| 畅广元 | 确立互补性的学术观念 | 1 |
| 费秉勋 | 天地无穷 | 8 |
| 葛兆光 | 乡路带我回家 | 15 |
| | 过去的故事 | 20 |
| 何满子 | 南北湖之什 | 25 |
| | 代坑 | 30 |
| 黄秋耘 | 雾失楼台 | 34 |
| | 重返三堡村 | 45 |
| 霍松林 | 缅怀邓宝珊先生 | 51 |
| 季羨林 | 幽径悲剧 | 58 |
| | 二月兰 | 63 |
| 蒋孔阳 | 尼亚加拉大瀑布 | 69 |

| | | |
|-----|----------------|-----|
| | 小溪和灯海 | 73 |
| 金克木 | 沉默之塔 | 78 |
| | 家藏书寻根 | 83 |
| 雷 达 | 我的文友秦晋 | 87 |
| | 缩略时代 | 95 |
| | 置身西西里 | 99 |
| 李 星 | 我的田野 我的小槐树 | 112 |
| 李书磊 | 夜读聊斋 | 118 |
| | 钟声悠远 | 126 |
| 林 非 | 从乾陵到茂陵 | 130 |
| | 晨曦里的回忆 | 137 |
| 流沙河 | 九句话 | 142 |
| | 吾爱吾师 | 146 |
| 刘 路 | 就《丑石》致贾平凹 | 155 |
| 刘梦溪 | 传统的误读 | 161 |
| | 心感 | 165 |
| 柳鸣九 | 一个展示了男性准共性的微笑 | 168 |
| | 人性中不容忽视的那“小自然” | 173 |
| 楼肇明 | 大地书页 | 178 |
| | 惶惑三重奏 | 185 |
| 牛 汉 | 绵绵土 | 198 |
| | 祖母的呼唤 | 201 |
| 潘旭澜 | 香山明月 | 205 |

| | | |
|-----|-----------|-----|
| | 山村年到 | 209 |
| 钱理群 | 哦，你是我的父亲 | 214 |
| | 我的那间小屋 | 220 |
| 王 愚 | 海南屐痕（节选） | 225 |
| 吴冠中 | 彩虹几时圆 | 237 |
| | 又见巴黎 | 242 |
| 秦 晋 | 演进与代价 | 247 |
| | 文学批评答问录 | 251 |
| 夏写时 | 访台偶得 | 256 |
| | 虞兮虞兮 | 262 |
| 肖云儒 | 文明膜中苍白的生命 | 268 |
| | 西陲纪美 | 273 |
| 萧 乾 | 八十自省（节选） | 286 |
| | 老北京胡同 | 292 |
| 谢 冕 | 永远的校园 | 296 |
| 杨 义 | 曲阜寻根 | 302 |
| | 恭王府花园寻梦 | 306 |
| 杨 绳 | 忆高崇熙先生 | 311 |
| 余秋雨 | 风雨天一阁 | 314 |
| | 这里真安静 | 330 |
| 张国俊 | 管房三记 | 342 |
| 张中行 | 故园人影 | 351 |
| | 历下谭林 | 358 |

| | | |
|----------|--------|-----|
| 赵鑫珊 | 人生就是等待 | 364 |
| 赵发元 | 京城访严秀 | 369 |
| 宗 璞 | 好一朵木槿花 | 375 |
| | 燕园桥寻 | 379 |
| 周同宾 | 一个人 | 383 |
| | 神曲 | 388 |
| 周介人 | 批评与自由 | 395 |
| 朱大可 | 囚者与遁者 | 399 |
| 邵燕祥 | 无可羡慕 | 422 |
| 选编后记 | | 431 |
| 后 记 | | 433 |

确立互补性的学术观念

——对人文学者一种品格的期待

畅 广 元

畅广元，1937年生，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校图书馆馆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著作有《主体论文艺学》《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

时下的人文学界有一个热门话题：“反省现代性”，据说，这与反激进主义有关。一些学人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其学术观点偏颇，政治功利

中国当代散文检阅

目的突出；由于他们误把现代化当作“西化”，因而无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与其对立的所谓文化保守派的态度也不公正。这种文化激进主义，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反思，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河殇》的出现，都是激进主义没有受到认真清算的结果。为了根本改变激进主义的价值取向，让新一代知识分子走向成熟，就有必要进行文化启蒙。于是，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本位，号召学人恪守学术立场，进而向传统文化资源皈依，甚至暗示纯粹的知识是一种超越社会并在本质上优于社会的价值，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学界千万不能有死相，它应该永远有生气，这就少不了“百家争鸣”。生动热烈的“百家争鸣”，其形态不能是单一的模式，然而我们学界不知怎的，一说争鸣，就想“反”个什么，似乎不“反”个什么，就不算争鸣，就没有气势，或就不能扭转什么局面。这实在是个误解。就说时下人文学界这个热门话题吧。从“五四”到现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互渗，总是伴随着学人的争鸣、辩论。大半个世纪里，潮涨潮落，人聚人散，既留下了不少问题尚待深入研究，又养成了党同伐异的习惯更待“止血化瘀”。眼下，二十世纪行将过去，世界各国的学人都为本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有所作为，谋划着、预测着。在这个当口，人文学界在“反省现代性”的名目下，做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之辩，其意义自不待言，理应重视和支持。只是这场争辩，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批判，是一种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根本性转变，并且有着重构一代或几代学人学术心态的指向，因此，人们就不能不严肃审慎地对待。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激进主义”就可以了事的。

~~~~~学者卷~~~~~

“五四”以来的“激进”与“保守”，作为学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和学术态度，围绕着怎样考虑民族命运和对待中西文化，二者确实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不只是人为的，它更有其深刻的时代、思想和学术上的根源。假设稍后的人文学者能与论争保持应有的心理距离，客观科学地看待“激进”与“保守”之争，不搞什么“一边倒”，我想不应对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学术或学术以外的贬抑。无奈“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今天，仍说“时代既近，恩怨犹存”，恐怕亦不为过。而且，似乎“恩怨”中还多了一层涵义，这一点陈晓明同志在题为《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的文章中已经点破。笔者绝不是说“激进”不可反，而是认为“激进”与“保守”并非只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久被人们忽视的互补一面。如果能以互补的角度重新审视学术上的这场争辩，可能会收到“后世之公”的效果。

互补，显然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但是，承认差异并不一定能走向互补。承认差异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相互视为异端，如冰炭水火之不相容，各自以攻乎异端为快事。譬如，中国文化素来注重“夷夏之辨”，汉文化居于中心地位，自视很高，只能“用夏变夷”，决不能以“夷”变“夏”。清初杨光先抗拒西学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是耶稣会士企图“用夷变夏”，“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其二，相互视为参照，虽各走各的路，却不妨借鉴一下对方的走法，互以能从对方取其所需为快事。晚明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诸君是最先在中国倡言西学的科学家。他们钻习西学时，发现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彼此有着若干相似或相通之处。为了用中国固有文化解

~~~~~中国当代散文检阅~~~~~

释这种现象，他们简单地把西学与中国“圣人所已言”联系起来；后来康熙皇帝明确提出“西学中源”的看法，虽谬误却大大化解了夷夏之防的禁忌；再加上“礼失而求诸四夷”，也是古人早有的明训，于是，参照西学，兴办洋务，很是热闹、堂皇了一阵子。两种思路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均有所实践，各自的效果如何，当然不能仅以今人之眼光定优劣。但如就“五四”以来的“激进”与“保守”之争来论，前一种思路，各执一端，相互指责，愈走愈远，愈演愈烈，容易陷入形而上学是就绝对的是，非就绝对的非的泥淖，则是显而易见的。视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者，看不到本土文化的特长，把“西化”当作最终的价值追求，固然失之“激进”；而过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对的价值，看不到西方文化之特长，把“中长”当作世界文明之归宿，难道就不“激进”么。陈晓明说“保守派”对现实的投入并不亚于“激进派”，说的极是。足见一旦执行一端，就难免不偏颇。时下的反“激进”，就其总体态度看，并不就是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确实让人欣慰。但中国人文学界处于日趋成熟而尚未成熟的阶段，跳到另一极端，再度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的客观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后一种思路，应该是既承认并且强调中西文化之异质，又不把它们看作一对完成了的对立封闭体，彼此可以在取长补短中发展各自的特点。王元化先生在《“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撮要》一文中，对杜亚泉的“调和论”作了如是的描述：“他将西方归为动的文明，东方归为静的文明。他认为动静应当互补，各取对方之长，以补自己之短。”应该说，杜亚泉的学术眼光更具有深刻的历史感。

事实上，没有哪个民族的传统，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俗文

~~~~~学者卷~~~~~

化，是完全守旧的。文化问题，说到底是关乎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境界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存在，只要前进，其文化传统必然要被现实中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加以选择与活化。这种选择与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能使本土文化在封闭状态下自我积淀，必须不断地吸入与排除、构成与破坏、积淀与突破，如是，才能防止其僵化与衰亡。尽管这种对文化传统的选择与活化，在激变的时代与缓进的时代有所不同，但却是不会停止的，所以传统不可能是完全守旧的。从科技学术方面看，当西学最早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时，晚明实学派徐光启等就认为它有利于纠正徒尚空谈的心性之学，遂以开放的心胸容受西洋学术，使他们的实学活动突破了传统的经世实学的发展路径，显示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就人文学术方面说，“五四”时期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然而儒家的价值观并没有真正地被摒弃，就在当时和其后，它仍被学人从不同的方面不断地予以阐释，其中就包括运用西学的学理与方法所作的阐述。胡适、顾颉刚等人，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所谓“高层次的批判”者，他们寄希望于“西化”了的未来，却渴望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而且也心满意足地找到了一些能生长出现代文化的中国思想来。就胡适言，其指导思想正是他的导师约翰·杜威倡导的科学态度，特别是其关于渐进增长的进化观念。这说明，引进西方学术的学理与方法，对中土文化的演化与发展，并非全然是有害的东西。就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人，他们对中国传统的雅文化极为关注和维护，认为这是体现中国精神的，但他们并不拒学西方学术。在论证自己的立场时，常也毫不犹豫地借助于西方思想。这种现象可否这样认

~~~~~中国当代散文检阅~~~~~

识：他们并不相信传统的中国文化能依赖自身保持其长处，民族自尊心也有赖于寻找中西相同的思想来维护。与胡适相比，他们是希望能得到西学学理与方法的好处，却又不愿牺牲中国的精神基础。而胡适们则是为了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得不从本土文化中汲取其所需的滋养性资源。出发点的确有别，但都明示出了中西文化具有实实在在的互补性，是不容置疑的，虽然我们的描述仅取西学对中学的角度。如果肯定了异质的中西文化可以在互补中发展各自的特长，为此而持激进或保守立场和态度的学人，何必非得以互反为自我存在的前提呢？担心激进者倡言西化而“全盘否定传统”的学人，不要忘记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先期占有。当他们在为自己的西化寻找本土文化的滋养性资源时，就是在调节自己的西化模式，使其具有民族认同感。中山先生倡导革命，较之康、梁的变法要激进得多，而且就他个人言，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外国化的中国人，最少中国的传统经验，可他同样无法丢弃我们民族的认同感。忧虑保守者倡言保存国粹而“反对吸收现代西方文明”的学人，也不要忘记任何人都必定要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重新创造属于他的意义世界，一丝不动、分厘不差地保存国粹，在受外来文化刺激而涌起的文化革新浪潮中，是不能存在的。当他们借鉴西方的学理与方法，发现了儒家文化有着面向“外在”与“内心”的本质（梁漱溟），把朱熹的“理”，按二十世纪早期一度繁荣于英美的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给予解释（冯友兰）时，就是在调节自己的认知结构，使其具有时代的认同感。总之，中西文化的互补性实际上已经让“激进”者与“保守”者的学术思路各自向对方投射，这是一种具有一定的亲和性的力，而不